

方豪的天主教史研究*

——以《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为例

修彩波

(莱阳农学院人文与公共管理学院, 山东 青岛 266109)

摘要: 方豪在天主教史研究方面成就颇丰。以《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为代表,他不仅对天主教传入中国的原因、过程及与中国文化的相互影响作了精深的考究,而且还从诸多方面展拓了天主教史的史料来源,为中国天主教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方豪;天主教史;《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史料来源

中图分类号: K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41(2006)01-0089-05

Fanghao's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Catholic

— on the Stories of Chinese Catholics

XIU Cai-bo

(Dept of Humanity and Public Management, Laiyang Agricultural College, Qingdao 266109, China)

Abstract: Fang Hao achieved a lot in the history of Catholic in China. The publishing of the Stories of Chinese Catholics serves as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Catholic in China. Not only did he carry out a detailed study of such elements as the importing process and reason of Catholic and mutual influence between Chinese culture and Catholic, but also collected information from both home and abroad, enlarging the research scope of the history of the history of Catholic.

Key words: Fanghao; Catholic; the Stories of Chinese Catholics; resource of history information

方豪(1910-1980)是我国现代著名史学家、天主教神父。他自幼受洗入教,并入修道院接受神学教育,自然与宗教史有不解之缘。正如他自己所言:“独余少入道院,嗜古颇深,有整理教史之志。”^[1]再加之私淑陈垣先生,深受其治史方法与史学思想影响,因此,对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有着精湛的研究,特别是对天主教耶稣会来华的原因、经过及影响的研究尤为精深。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是方豪天主教史研究的代表作,1967-1973年由台中光启出版社出版。全书共三册,以中国天主教史上有关人物作为叙述

中心,共收录天主教士305人。以人为经,以事为纬,史以人类,人以史传,基本按时间顺序排列。从人物的活动中可以窥见当时教会的活动情形,虽名曰人物传记集,实为一部中国天主教史。

该书出版之前,人们研究耶稣会士时,多参考法国学者费赖之的《入华耶稣会士列传》。费书共收录耶稣会士467人(含中国人70人),所叙以外国会士为主,以到华年代先后为序,中国会士则以入会先后为序,目的在于“证明基督教之真实,而传教者之离其祖国并非为欺骗华人而来也”^[2]。与费书相比,方书有以下特色:

首先,方书虽为列传,实重“史”字。方氏在序

* 收稿日期: 2005-10-23

作者简介: 修彩波(1969-),女,山东海阳人,莱阳农学院人文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学术史、文化史。

言中,对其书名有一解释:“我之所以取名《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而不取名《中国天主教人物传》,可见我重在‘史’字。”^[3]此书史的性质十分突出,无论是从书名、选材到整部书的结构安排,无不体现这一特点。

从全书来看,书中所列人物,以记其成就为主,除少数以传记形式记述其生平事迹外,大多并不以传记的形式出现,而是着重叙述这一人物最能反映其所处时代天主教历史特征的事迹,或其在教史上所作的主要贡献。通过这些事迹或贡献,将天主教史中重大史实按时间序列出,以展示中国整个天主教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如《马黎诺里传》中,涉及其本人的内容很少,主要篇幅则用于介绍“佛郎国贡马”一事,并依据中西交通史料的汇集,证明佛郎国即罗马教庭,从而说明早在元顺帝时,天主教已开始与中国有所接触。《汤若望传》则重在叙述汤若望与顺治帝的关系,同时又介绍了他在西洋文学和修历学上的贡献。通过毕、汤二传,人们可以了解明末清初朝廷对于天主教传入中国的态度。康熙末年的“礼仪之争”,是中国天主教史上的一件大事,书中选择了与“礼仪之争”有密切关系的多罗、嘉乐、德理格三人分别列传,以三人为线索,对其起因、经过、结局、影响详加介绍,读者便对这一标志天主教史上重大转折的历史性事件有一完整的了解。

在结构上,方书一改费书每人分列一传的单一形式,往往采用合传的形式,将有共同特征的天主教人士合为一传。费书中意大利的闵明我、葡萄牙的徐日昇和比利时的安多三人各列一传,方氏则以他们三人均为耶稣会士,共同参与过清朝对俄外交工作、曾护驾出关、都知天文历法而将他们列为一传。此外如永历宫中王太后、马太后、王后及王子慈烜均为信教人士,雷孝思、杜德美、费隐、山遥瞻等人,康熙年间都参与过测绘全国地图,书中都将他们合为一传。合传的采用不仅丰富了形式,使整部书变得活泛起来,更主要的是它比单传更能体现人物的主要事迹,更易展示中国教史发展的重大事件和人物的主要特征,从而将整个中国天主教史的发展过程基本勾画出来。

其次,所列人物范围广泛。方书共三册,共收录天主教士305人。虽说在数量上少于费书,但其所列人物的范围却大大超过费书。补费书之所遗漏,详其之所忽略,且注意到下层的小人物与教友,也为该书的一大特色。

方书列传重在以对天主教有所贡献为原则,“凡是对中国天主教史有重要关系的人”^[3]无不包罗在内。唐代的景教和元代的也里可温教历来被西方天主教界视为异端,方氏在研究天主教的过程中,大胆冲破了这种传统观念,认为他们所遗留下来的汉文献中,没有一丝不符合天主教义的。因此,不但将景教徒阿罗本、景净、阿罗憾,元代的也里可温马薛里吉思、马祖常等列入传中,而且将传说中的圣多默宗徒也列入传中。马可波罗从未从事过传教工作,但因《马可波罗游记》中有关天主教的史料十分丰富,方氏书将其列入传中,充分肯定了马氏在中国天主教史上的贡献。在中国天主教史上,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三人以“三大柱石”闻名,费书中根本无传,方书则施以重墨,对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及传播天主教过程中的贡献大加表彰。罗文藻是中国天主教史有深刻影响的人物,作为第一位中国籍司铎、主教和多明我会主教,人们在费书中却找不到他的传记,实属憾事,方氏则参阅并引用大量的教会内部文献,为之列传,彰显其业绩。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力阐扬利玛窦等辉煌人物贡献的同时,方书对那些在传教史上默默无闻而又作出贡献的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以及教外的教友,也予以充分的注意。其书下册所收人物即大部分为雍正至道光时期教难的殉难者,这些人物多为无名之徒、从未见之经传的,更有不少同治以前,身处川、滇深山幽谷中,以及偷渡到暹罗、槟榔屿或欧洲秘密攻读神学的神职人员。他们的事迹虽都不太多,有的仅存姓氏,但方氏认为他们对教会“前仆后继,亘百余年而不绝”^[3],便将其列入传中,其中很多人还是他首次从台北故宫博物院一些未被利用的清宫档案中发掘出来的。以前的教史传记,多以记主教、神父为主,很少述及教友,方书则突破了这种局限,不以主教、神父为限,对于成就卓越的教友也收录其中。其所列教友主要有:陈于阶、韩霖、李九标、王宏翰、张识、李九功、李嗣玄、陈克宽、林一儒等。书中还列出许多他认为是教友且有待于考证的人。上述处理显示了方书的过人之处,为这些人物立传,其意义不单是为清代的传教史、教难史提供了稀见的史料,而且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上,更全面完整地展现了天主教下层及教外活动的状况及社会影响面。

此外,方书中还收集了一些特例:如被称为“浙江奇士”的祝石,天主教史上争议颇大的丁魁楚等。

这既丰富了方书的内容,又增加了全书的趣味性和生动性,为后人研究教史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方氏潜心于天主教史研究,对其研究目的体味尤深。“有史则传,无史则绝,史之重要如是也。”^[7] 1947年,其早年有关天主教史的论文,汇集成《中国天主教史论丛》(甲集),由商务出版社出版。全书共集论文13篇,内容涉及与天主教史有关的校勘学、版本与史料学、古迹人物杂考、专题历史叙述、教会教外史料等五大方面。1948年5月,北平上智编译馆出版《方豪文录》,共收论文39篇,系集《中外文化交通史论丛》和《中国天主教史论丛》中重要篇目加以修改整理而成,多有关西方教士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文中引用大量西文书册及教会人士著作,均为一手资料,足可印证中国宗教史的若干问题,为当时人所未闻者。

对于历来争议较大的天主教传入中国的历史,方氏也作了深入研究。他认为,景教有广义与狭义两重涵义:狭义的景教原名为 Nestorianism,为聂斯托利(Nestorius)所创。广义的景教则包括基督教各派,唐宋时代已有人采用这种说法,到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皆称“景教后学”,清末学人则或以之专称天主教,或以之概称基督教,此风一直延续到民国以后。从景教的广义涵义出发,方氏认为陈垣先生天主教传入中国始于唐代景教说比较合理,公元七世纪以前,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史,虽有阿诺皮乌斯、科斯麻斯等人的记载,但均为片断,且不十分确实,因此不可信。据慕尔主教所著《一五五〇年前中国基督教史》导言的记载,他又对耶稣宗徒圣多默(St. Thomas Ap)曾到中国传教一事加以考定,认为“其文献出世甚晚,纯为后人所传”^[8],可信度不大。认为作为基督教的一个重要派别,中国的天主教与唐代的景教、元代的也里可温教是一脉相承的,不能跳过景教史和也里可温教史而空谈中国天主教史。

他又结合具体的时代背景,对这两个时期天主教的传入特点与明代天主教的传入特点加以比较,指出:“明季天主教之传入中国,为一完全创新之局势,与唐宋时代之景教及元代的也里可温,毫无联系。”^[8]认为天主教原名即为公教,意谓全世界之宗教,所以自耶稣会即无时无刻不向外发展,只是看机会如何。元时蒙古东征,中西旅途畅通,教士亦络绎东来,且在当时欧洲并无新成立的教会与天主教会为敌。从而否定了流行于史学界的明末天主教东传

是由于新教兴起后,在欧洲丧失地区与教友颇多,因此欲在欧洲以外努力扩张所致一说。并对此作了深入的剖析:与唐代的景教和元代的也里可温教相比,明末天主教的传入带有明显的地区特征,即为东亚传教事业的一部分,因此在机会上与东亚其他地区也大略相同。他将促成这一时期天主教再度入华的原因归纳为八条,其中尤为强调新航路的发现和天主教自身的改革,认为它们是促进西土东来的外部条件和内在动力;“若明季无新航路发现,或新航路虽发现而教会却自身不振,也亦不致有千百万教士冒险而来。”^[8]将日本人对中国的崇拜直接影响到沙勿略,以及葡萄牙人对中国的推崇也作为当时天主教东传的主要原因,为天主教传播史研究的一全新观点。

方豪还重点剖析了明末清初天主教在中国盛行的原因,提出了著名的“适应”说。他认为明末清初中国的天主教活动之所以能极盛一时,形成波澜壮阔之势,主要是由于中国天主教人士所作的“适应儒家”运动所致。指出佛教、回教、摩尼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外来宗教传入中国后,之所以有的发展顺利,有的则很快消失,除了政治因素及一些短期因素以外,关键取决于这些外来宗教是否能适应中国儒家学说。一种宗教要从其发源地传到其他地方去,“它必须先吸收当地的文化,迎合当地人的思想、风俗、习惯”,即“适应”。其中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是借重当地人最敬仰的一位或几位先哲的言论,以证实新传入的教义和他们先辈的遗训、固有的文化是可以融会贯通的、可以接受的,甚至于还可以发扬光大他们原有的文化遗产。^[9]从这一角度出发,他对明末清初天主教适应儒家学说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认为天主教初来,天主教士为易于吸引士大夫信教,因而适应儒家学说,是不足为奇的,也是很可嘉许的。天主教本身也主张入国随俗,只要无悖于天主教教理,是应该就合当地文化的,否则,不但教不易传,且将引起反感。这种“适应”对“适应者”来讲是高明的,只要不因此而使自己的教义变质,不仅无可厚非,毋宁是值得赞扬的;对“被适应者”来讲,只要“适应者”不曲解、不附会、不以消灭“被适应者”的固有文化为目的,多一些人来研究自己,吸收、翻译自己的学术、思想总是好的。但这种适应仅限于学术思想方面,不是势力上的“依托”,与唐代天宝和开元年间道教依托摩尼教、宋代摩尼教又转而依托道教、佛教有着本质的区别。上述这

些分析,把天主教史放到大的文化史的范畴下来加以审视,对其适应机制加以探讨,既是他倡导“东西文化平等”,以求中国文化与外来思想相融合的表现,也具有理论上的意义。

二

方豪关注天主教史研究,不仅表现在他对天主教来华的经过、活动及影响作了精深的探究,而且还表现在他对其史料来源的拓展上。方氏注重史料,强调新史料的发现和运用的意义。在他看来,只有不囿于旧有的材料,努力开拓新史料,力求发现前人未曾涉及的新材料,才能使学术研究有坚实的基础和新的生机。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他确也将其付诸行动,并取得了不斐的成就。

首先,方豪十分注重教内史料的运用。身为天主教神父,又精通拉丁文和法文,方氏研究天主教史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可以查阅大量的教会内部资料,这是非教内人士所无法比拟的。教内史料又包括两大部分:(1)国内教会史料。方氏在研究中,对于中国教士的著述多所参考。如在分析明清间天主教盛行的原因及其背景时,便引用了徐光启的《辩学章疏》、杨淇圆的《超性事迹》等大量的资料。(2)国外教会史料。这是最能体现方氏特点的方面。他认为:“研究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不应只在中国本土着眼”^[9],因而十分重视西欧天主教一手资料。梵蒂冈神学图书馆和罗马传信部档案室为非教内人士难以接触,所藏资料便更加宝贵。他充分利用其神父优势,对这两处及罗马国家图书馆、马德里国家图书馆、荷兰莱顿汉学研究院等地所藏资料进行挖掘,解决了宗教史上的许多问题。如:清代康熙年间,罗马教庭曾三次派使来华,前两次世人知者较多,第三次雍正朝时葛达都、易德丰的出使,只有罗光所撰《教庭与中国使节史》中,以《出使的余波》为题有所记叙。这次出使,我国方面的材料很难觅获,方氏则根据罗马传信部档案室尚存的汉文原始资料,将这次出使的时间、经过和影响考察得清清楚楚,并纠正了《出使的余波》中的错误。

对于西欧以外其它国家所藏的教内史料,他同样予以重视。明万历年间,华侨流寓菲律宾的甚多,中国文化亦随之传入,印刷术便是其中之一,大量印刷品的出现,又将西方的宗教与科学介绍于我国华侨,印刷品便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此事以往知者甚少,偶有述及,亦未受人重视。方氏从马尼拉最早刊印的中国教义书中得到有力的启示,认为研

究基督教历史,还“应从卧亚、巴达维亚、麻六甲、马尼拉、长崎等处去搜求资料”^[9]。经他对明万历年间马尼拉刊印书籍的搜索与考订,发现此类木刻书现知其名者有九种,有五种尚存于世,除一种为西班牙与达伽洛(Tagalog)文外,其余四种均为中文,散藏于马德里、维也纳、梵蒂冈和莱顿四处。这些资料的发现与运用,为天主教史的研究开拓了新的资源,极为研究者所重视。

其次,他还运用了大量的教外史料。明代自利玛窦入华,到乾隆厉行禁教时止,是中国天主教史上的全盛时期,对此教会内外均有史料记载。方氏认为,当时“教外人记述者,较教会更多、更详。”^[8]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引用了大量的教外史料。如他在《明清间天主教之盛行及传布地区》一节中,便引用了杨光先《不得已》、王朝式《罪言》、黄贞《辟天主教书》、万斯同《明乐府》及全祖望《鮚埼亭集》中的有关材料,来说明当时天主教在中国的规模之大与影响之深。

在教外史料中,方氏对反天主教人士的言论尤为重视,认为“这类的历史价值更高”^[4]。在明末西洋科学与宗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影响最大、名气最响的莫过于利玛窦。人们对利氏的评价直接受当时国人对于西洋科学和天主教态度的影响。约而言之有四派观点,其对利玛窦的评价众说纷纭,大相径庭。针对这种情况,方氏认为教中人对于利氏贡献及博学的称赞,“出诸教中之口,难博人信”^[4],而反天主教派的言论“却在不知不觉中,为利氏极端誉扬”^[4]。因此,更注重从反天主教派那里寻找证据。如在《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便大量引用李玉庭反天主教书《诛邪显据录》,以见利氏的博学多问;引林启陆的《诛夷论》,说明利氏在华影响及名气之大;引林光、邹元标《愿学集》,以反证利氏沟通天主教与儒家之成功。认为所有这些出于反天主教人之口的言论,是证明利氏在华传教成功的“绝好史料”^[4]。清代禁传天主教,康熙时已露其端。方氏认为中国禁教原因虽多,但主要是受日本禁抑天主教的影响。日本方面对此记载颇多,而我国载籍中有关他国禁抑天主教详情的资料却很少。他潜心对清代有关史料进行爬梳,并将苏及寓的《邪毒实据》等典籍中对日本以“蹈绘”查验教徒之记述录出,认为以上诸文虽仅记述日本事,但其不利于我国的天主教,又引日本永山时英所著《增订切支丹史料集》等严禁天主教由中国传入日本之文献加以佐

证,证明中国禁抑天主教所受日本影响之大。

第三,擅于从家谱中挖掘天主教史料。方氏认为,家谱内容丰富;“凡民族之渊源、家世之迁徙、人寿之短修、生殖之强弱、遗传之优劣、天灾之演变”,均可由此求之。但由于历代“少人笃嗜”及“谱状自身不振所致”,因此应用不广,其史料价值也没有充分的体现出来。他指出:“方志为国史所依据,家乘又为方志之雏形,治史者能不注意及此乎?”^[4]对家谱在整个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予以肯定,尤重家谱中天主教史料的研究。并以玉山吴、徐二家谱中之教会史料为例,对家谱中教会史料的价值、范围、特征及其应用作了详细的论述。家谱中教会史料之所以重要,他论析主要由五方面原因所致:首先,有的教友历数代而不出文人,既不能有所述造,又没有人可以预修谱之役,因此导致教友家谱中未必有史料。其次,自康熙后期至嘉庆、道光、咸丰、同治时,国家禁止传教,虽有松有弛,但民间仇教之风盛行,因此像吴氏日中、至中,徐氏永春、永隆等教友寡少之族,家谱中更是少有教会史料可得,或残缺不全,而雍乾、嘉道年间的教友,为免受迫害而不署圣名。第三,家谱中教会史料多为后人所篡改。第四,家谱为非卖品,印本很少,且分藏在同一家族中若干家,外人很难借阅,不像方志那样容易收集。第五,自罗马教廷于1742年明令取缔敬祖仪式后,教友多为同族之非教友所排斥而不能入祠,且有被“割谱”者,因此仅存下来的宗谱中的宗教史料便显得极为宝贵。

方氏认为家谱中教会史料的范围,主要包括遗像、教中人之纂修员、教中人所撰的序跋等。据其名、字、别号、职司、姻亲与墓地等,可考察族中是否有教友及奉教年代,钩稽教中人的传记、碑文及族人所赠的匾额、联对、寿序、诗词等;同时又可弄清当时教会的盛衰以及教友的优劣状况,并可通过这些资料窥见当时传教的方法及遭遇之困厄。家谱虽不易获

得,且其中的教会史料也不丰富,但方氏认为“教友之入家谱,颇多特征”^[9],如教会的司铎、修士、修女以及会长,常有特加著录以为荣者;有领洗名、安葬圣地等。并指出应用家谱教会史料所应注意的十个问题。如果说陈垣先生撰《休宁金声传》,引其文集中《城南叶氏四续谱序》以证金声为天主教徒,开引用宗谱中宗教史料之先例,那么,方氏则对此加以发扬并使之系统化,其所阐释的有关原则、注意事项及其实践,则为后来研究者发现并引用家谱中的宗教史料起了示范作用,其功不可没。

总之,方豪在天主教史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史料搜集之宏富、视野之开阔、态度之求实,在整个天主教史研究领域中都非常突出。《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的出版,为天主教研究史上的一大成就。它不仅首次对天主教传入我国的历史作了较为系统的整理,而且注意吸收中外史家的研究成果,提供了研究天主教史的重要参考资料。这些搜集于20世纪30~50年代的资料,特别是西方传教士的文献资料,至今仍为研究天主教史的重要依据。而方氏所提出的若干相关原则和方法,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所继承。

参考文献:

- [1] 方豪. 杰人论存·自序[A]. 方豪六十自定稿. 台湾:台湾学生书局,1969.
- [2] (法)费赖之.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原序(冯承钧译)[M]. 北京:中华书局,1995.
- [3] 方豪.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写在前面(上)[M]. 北京:中华书局,1988.
- [4] 方豪.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M]. 北京:中华书局,1988.
- [5] 方豪.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M]. 北京:中华书局,1988.
- [6] 方豪.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M]. 北京:中华书局,1988.
- [7] 方豪. 中国天主教史论丛·甲集目次识言[C]. 上海:上海商务出版社,1947.
- [8] 方豪. 中西交通史[M]. 长沙:岳麓书社,1988.
- [9] 方豪. 方豪六十自定稿[M]. 台湾:台湾学生书局,1969.

(责任编辑:步蕾英)

方豪的天主教史研究—以《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为例

作者: [修彩波, XIU Cai-bo](#)
作者单位: [莱阳农学院人文与公共管理学院, 山东, 青岛, 266109](#)
刊名: [莱阳农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LAIYANG AGRICULTURAL COLLEGE \(SOCIAL SCIENCE\)](#)
年, 卷(期): 2006, 18(1)
被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9条)

1. [方豪 杰人论存·自序](#) 1969
2. [费赖之. 冯承钧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原序](#) 1995
3. [方豪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写在前面](#) 1988
4. [方豪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 1988
5. [方豪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 1988
6. [方豪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 1988
7. [方豪 中国天主教史论丛·甲集目次识言](#) 1947
8. [方豪 中西交通史](#) 1988
9. [方豪 方豪六十自定稿](#) 1969

相似文献(2条)

1. 期刊论文 [修彩波 读方豪的《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华夏文化2003, "" \(1\)](#)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是方豪撰写的一部人物传记集,也是他研究天主教史的代表作之一.全书以中国天主教史上有关人物作为叙述中心,以人为经,以事为纬,史以人类,人以史传,基本按时间顺序进行排列.从人物的活动中可以窥见当时教会的活动情形,实为一部中国天主教史.
2. 期刊论文 [修彩波 试论方豪的宗教史研究—贵州文史丛刊2003, "" \(1\)](#)
方豪在宗教史研究方面颇具成就,其研究以天主教史为主,〈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为其重要成果之一.在详考天主教传入中国的过程、原因以及与中国文化的相互影响等诸多因素的同时,又对回教、摩尼教等其他外来宗教进行了较深的研究.并对浙江诸外来宗教重点考察,开宗教区域研究之先例.他还注意展拓宗教史史料来源,对宗教史研究,有发扬光大之功.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lynxxyb-shkx200601022.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ef62a8bb-2cc6-4340-8bd2-9e4d0080d91c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